

中国古代对黄河源头的多元思考

□孙景超

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,对于中国的文明进程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,由此,也激发了人们对黄河源头的兴趣。黄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,对于中国人而言,不但是一个地理学问题,更是一个文化问题。自古以来,这一问题始终为人们所关注。在对黄河源头的认识与探索的历史过程中,产生过多种不同的说法,其中真实与想象并存,并掺杂着神话传说与种种讹传。为了验证这些说法,历史上人们曾对黄河源头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,并最终确定了黄河源头所在。

古代文献的记载中,对黄河源头有两种说法,即“积石说”和“昆仑说”。由于古代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,因此对地势高寒的青藏高原很少探知,对黄河源头地理的认识只能达到黄河上游的积石山附近(大约位于今阿尼玛卿山),此山海拔亦相当高,容易使人们以为黄河发源于此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《尚书·禹贡》提出“导河积石”,开“导河积石”说之源。但黄河作为四渎(河、江、淮、济)之首,积石山的名头显然尚不足以与之相称,大川出名山,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昆

仑山自然是黄河源头的最佳选择。因此,在与《尚书》差不多同时成书的《山海经》记述道:“昆仑之虚在西北……河水出东北隅”,此即“河出昆仑”说之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对黄河上游与青藏高原地区的探索愈加深,“导河积石”说既不符合地理实际,在文化与心理上也缺乏依据,因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而“河出昆仑”说的主要问题在于昆仑山在地理上未得到确认,清代胡渭考证:“自汉以前,但知昆仑在中国西北,终未明在外国某地也。”但令人奇怪的是,“河出昆仑”说在文化上异常稳定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加强。

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,不但实现了中西交通上的“凿空”,对河源与昆仑山的关系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载:汉使穷河源,河源出于寘,其山多玉石,采来。天子案古图书,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。张骞所见即今塔里木河上游,但该河下游消失于沙漠之中,与黄河并无实际关系。为此,又有“伏流重出”之说,即塔里木河之水在沙漠中潜流到地下,然后流向东方,至积石山又

重新涌出地面。这种说法将黄河水系与塔里木河水系连在一起，确立了“黄河重源说”。对此，汉代人有如下解释：“河源出昆仑，伏流地中方三千里，禹导而通之，故出积石。”（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高诱注）借助于皇权的权威力量与学术上的调和，“河出昆仑”说在文化上得到了正式的确认，其影响持续达两千年之久。直到清末，陶葆廉在《辛卯侍行记》中仍说，“河有重源，均出昆仑，稽古证今，一一吻合”，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但黄河源头并不在昆仑山，这种理论上的统一确认并未完全阻断人们对河源地区的实际探索。西晋张华撰《博物志》曾记黄河源头在星宿海，但未作具体说明。隋炀帝大业五年（609年），平定吐谷浑，置河源郡，治所赤水城在今青海兴海东南，辖境相当于今青海部分地区，距离真正的河源已经不远。以“河源”一词来命名政区，反映了当时的人们认为河源就在附近。

唐代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交往频繁，对河源地区留下了诸多记载。《旧唐书·吐谷浑传》载：“（李）靖等进至赤海，遇其天柱三部落，击大破之，遂历于河源……又达于柏梁，北望积石山，观河源之所出焉。”这是历史文献上开始明确记载有人到达河源地区并进行观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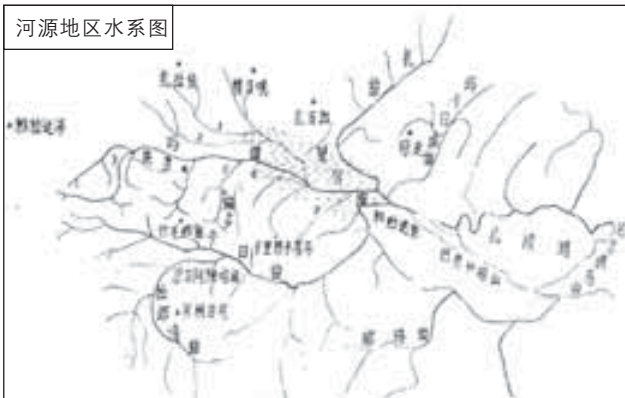
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刘元鼎奉使吐蕃，道经河源地区，他描述道：“河之上流，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，水益狭……其南三百里三山……东距长安五千里，河源其间，流澄缓下，稍合众流，色

赤，行益远，它水并注则浊，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。”（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）近人吴景敖考证，紫山为今巴颜喀拉山。刘元鼎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河源出于紫山，更描述了其水源状况，是对黄河源头地区水文状况的最早记载。

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（1280年），派遣都实探求河源，“阅四月，始抵河源，是冬还报，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”。这是历史上首次有目的地对河源进行考察。其考察成果保存在潘昂霄所撰的《河源志》中，书中记载此行曾越过黄河上源的两巨泽“阿刺脑儿”（指扎陵、鄂陵二湖），及“槃若列星”的“火敦脑儿”（指星宿海）。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，元代对黄河源头的认识已经反映在地图绘制中，陶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中就保存有《黄河源图》。

清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拉锡、舒兰等奉命考察河源，撰有《河源记》，并绘有《星宿河源图》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，朝廷派遣喇嘛楚几沁藏布兰木占巴、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前往河源地区测量，次年编绘的《皇舆全览图》吸收了这两次的成果，标明黄河上源的三支，中间一支名为阿尔坦必拉。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，阿弥达奉命探河源，据他报告：“星宿海西南有一河，名阿勒坦郭勒，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，郭勒即河也。此河实系黄河上源，其水色黄，回旋三百余里，穿入星宿海，自此河流至贵德堡，水色黄，始名黄河。”据后人考证，阿尔坦必拉即今约古宗列曲，阿勒坦郭勒为今卡日曲，正是黄河源头的两条主要支流。通过上述考察，黄河源头

河源地区水系图



为黄河正源，雅合拉达合泽山是它的源头，鄂陵湖在西，扎陵湖在东。这一结果与前人考察结果不相吻合，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，但黄河发源于约古宗列曲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，在不少著作和教科书中都采用此说法。

的实际情况已经基本清楚，但两次考察结果的差异，也引发了后世对黄河正源的争论。这两次考察成果，保存在清代的《皇舆全览图》《水道提纲》《大清一统舆图》等著作和地图之中。

上述实地考察，虽然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黄河的源头情况，但仍然未能动摇“河出昆仑”与“伏流重源”之说。大学者纪昀主持修纂《四库全书》，在作《河源纪略》时，依然一仍旧说，甚至认为卡日曲水色黄浊源于经过沙漠，证明了“大河灵渎，虽伏地千里，而仍不改其性”，这一说法也沿至清末，可见成见之深。

清末民国时期，仍不断有中外人士探索黄河源头，如1879年的印度人班智达阿喀（Pundit AK）、1882年的法国人赛脱勒依、1884年的俄国人普尔热瓦斯基（普介凡）、1900年的俄国人科兹洛夫和1907年的德人台飞（Albert Tafel）等，但在具体认识上并无超越古人之处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对黄河源头进行了多次考察。1952年，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黄河河源查勘队，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勘查。此次考察认定约古宗列曲

有鉴于此，1978年，青海省人民政府邀请中央和地方有关科研专业人员，再次对黄河源头和扎陵、鄂陵两湖进行实地勘查，最终确认卡日曲为黄河正源，扎陵湖在西，鄂陵湖在东，由此计算出黄河的全长为5464公里。但1985年，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，仍确认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。1999年，国家水利部与青海省人民政府树立黄河源标志，由江泽民题词，这是我国所立的第一座大江大河地理标志，其位置正位于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（藏语黄河源头的意思）。

对此结论，仍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，这是由于在认定河源时采用的标准有所不同，或依源头长短，或依水量多寡，或依流域面积大小，同时还要考虑河流走势、历史文化传统、民众的情感认同等，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有所差异。但对于黄河源头的基本情况，人们已经掌握得极为清晰。至此，与中国地理与文化相始终的河源问题也顺利地画上了句号。

作者单位：安阳师范学院